

正名：AI 时代婚姻的“去用存名”与纯粹规范性的生产

当功用退去，名字并非空壳；一个仍被共同守住的称谓，可以成为两个人为彼此留下的位置。

王德生 · 婚姻幸福专栏 · 约 2.2 万字 ·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婚姻正经历一场不易察觉却不可逆的形态转化。既有分析多从功能视角出发，将其困境诊断为制度性“空心化”或符号性“过度赋义”，二者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规范力量必须建立在对应的实际功能之上。本文尝试撤销这一预设本身。当人工智能等力量系统性地改变情感陪伴的稀缺性条件，婚姻赖以辩护的经验功能（“用”）的排他性渐趋松动，其规范性形式（“名”）并不必然随之消散。一个此前被遮蔽的发生机制于此显形：婚姻的“名”从必须援引“用”去说服的从属地位中挣脱，被转化为一种不诉诸“你能得到什么”的经验论证、直接作为“你是或不是”的身份裁定的纯粹规范性力量。下文将这一由功能真空反向提纯规范性的机制命名为“正名”。文章回溯了婚姻从“名实同构”到“名实分离”的历史条件变迁，分析了AI如何以一种比“替代”更隐蔽的方式——改变情感回应的稀缺性结构——松动婚姻最后的经验地基，揭示了亲代压力、商业文化与政策惯性这三股力量如何协作运转“正名”机器，并分析了个体在“无名之名”的强制下所承受的消耗性张力的具体形态。文章指出，任何试图为旧的“名”寻找新的“用”的修补努力，都因固守在“正名”的结构内部而注定失效。更具可能性的方向，是承认矛盾本身，放弃整个“正名”结构，将婚姻降格为一个中性的法律工具，去承载那些正在被当前矛盾条件逼出来的具体的、后置的生命结盟。文章最后郑重给出该论断的证伪条件，并正面处理其文化适用边界。

关键词：婚姻困境；正名；去用存名；纯粹规范性；AI 情感代理；名实之变

一、引言：功能已逝，为何招牌更亮？

我们正身处一个关于婚姻的奇特的二律背反之中。

一方面，构成其传统地基的功能要件正被技术、市场与个体化浪潮逐一抽离。从平台外卖到家政外包，从独立薪资到社会保障，婚姻作为“生存协作单元”的必需性已降至历史低点。更深刻的一击来自人工智能：它能提供永不倦怠的共情、无需情绪劳动即可获得的“被理解感”，甚至在某些维度上比真人伴侣更能精准回应个体的深层情感需求。可以说，婚姻作为一项制度，其可被指认、可被言说的经验功用，正在系统性地消退。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话语对婚姻的推崇与执念并未随之消退，反而在局部领域愈演愈烈。“灵魂伴侣”的神话仍在荧幕上反复擦亮；催婚的压力并未因单身生活质量的实质提升而减弱；公共叙事里，婚姻仍被隐喻为个体成熟度与人生完整性的试金石。一面是实际功能的系统性撤出，另一面是符号光辉的固执高悬。地基越空，招牌越亮——这构成了一个难以用常理解的矛盾处境。

面对此一悖论，主流分析常陷入两种简化。

一种归咎于“技术冲击”，认为 AI 伴侣将直接取代真人配偶。此说高估了技术的短期替代性，却严重低估了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的符号韧性。后者并不建立在对当前功能的精确计算之上。个体选择婚姻，从来不只是因为它在当下“有用”；制度对人的强制，也从不因功能衰退而自动退场。用“替代”的逻辑去理解婚姻的困境，一开始就错失了问题的要害——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替代了婚姻的功能”，而是“功能被替代之后，为什么婚姻的强制力量反而更纯粹了？”

另一种解释诉诸“观念滞后”，认为文化未能跟上物质变迁的步伐。此说触及了表层现象，却未能揭示“滞后”背后那套精密的力量生产机制。为何一个失去现实根基的观念，不仅能继续存活，甚至能被赋予更强的道德感召力？这不是简单的“迟到”，而是一种主动的、反向的力量注入。观念不是被动地“没跟上”，而是被主动地重新生产和强化。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观念为什么滞后”，而是“这股反向注入的力量从何而来”。

为解释这一反向注入，有学者提出了“过度赋义”的概念[1]。它敏锐地捕捉到，在婚姻功能衰微之际，其符号意义被社会行动者系统地、反复地拔高，以对抗功能流失带来的集体焦虑。这一论断的洞见在于，它识别出功能的衰退与符号的膨胀是耦合发生的——符号不是功能的简单反映，而是在功能危机中被激发出来的补偿性力量。然而，本文要指出，其理论根基仍默许了一个坚固的预设：无论符号如何膨胀、如何与功能“脱钩”，它终究是对功能状态的一种反应——一种补偿，一种扭曲的反映，一种异化。整个批判的立足点，仍然是那个古老而坚固的信任：规范性的力量，必须建立于其对应功能的某种真实性之上——哪怕这种“真实性”已经衰微、已经变形、已经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残余。其解决之道，因此自然地指向了为悬空的符号寻找新的、真实的功能，重建“名”与“实”的耦合。

本文要撤销的，正是这一底层预设本身。

本文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正名”——“正名”所指认的，是这样一种尚未被充分命名的发生过程：当婚姻的实际功能（“用”）被系统性剥离后，其残留的规范性形式（“名”）并非一个等待被新功能重新填充的被动容器；它本身就被转换为一种新的、纯粹的力量形态。这种力量不再依赖于“它能给我带来什么”的经验性论证，而是直接作为“正确的事本身”施加一种无条件的、近乎先验的强制。下文将这一由功能真空反向提纯规范性的发生机制，称为“正名”[2]。

这一区分的分量在于：它不是程度上的差异（从“过度”到“更过度”），而是形态上的断裂。在“过度赋义”的逻辑中，符号终究是功能的一个依附项——哪怕这个依附项已经膨胀到遮蔽了功能本身。

而在“正名”的逻辑中，符号切断了与功能的依附关系，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它不再回答“婚姻有什么用”，而是直接声称“婚姻就是对的”。这不是补偿，而是转化。补偿是：功能弱了，用符号来填补空缺，符号是功能的代理。转化是：功能空了，符号反过来把“空”本身做成了一种绝对的力量——它的不可反驳，恰恰来自功能缺席后留下的那个无法被经验讨论的真空。前者是功能的影子，后者是影子取代了功能、并声称自己从未需要过功能。它的力量形态，是人类精神史上一类极为古老的现象：当某种规范丧失了所有可见的经验根基，它反而可能获得一种伪神圣性——它不再需要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辩护都预设了检验的标准，而它已将自己悬搁于一切检验之外。

“正名”不同于“证明自己有用”，它是“‘名’在‘用’退潮后的自主显现其绝对力量”。它无需辩护，因为任何辩护都必须诉诸经验，而经验已经反证其非必要。它的力量，恰恰源于它悬空了一切经验讨论，直接诉诸一种“你应该”的绝对律令。

一个简短的现象勾勒，或许能帮助我们初步体认“正名”与非“正名”的状态差异。设想两个家庭。在第一个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催婚互动尚能被经验反驳弱化：子女可以用稳定的独居生活、明确的职业规划、有限的精力去回应，双方即便无法完全达成共识，至少仍在同一套经验语言的棋盘上对弈——“你需要婚姻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被提出、被讨论、被部分地化解。而在第二个家庭中，催婚已不再呈现为可对话的经验议题。父母不再试图论证婚姻的具体好处，他们只是反复传递一个强烈的态度：你应该结婚。任何基于子女当下生活体验的反驳，都像打在棉花上，因为对方根本不接“体验”这张牌。他们打的是一张非经验的牌：“不结婚不对。”这正是“正名”在微观互动中的显形：它不是一种可讨论的规范性（“因为X，所以应该Y”），而是一种纯粹的规范性——一个光秃秃的“应该”，一个失去了所有“因为”的“正确”。

下文将以“正名”为棱镜，重新观照 AI 时代婚姻困境的生成机制。首先，回溯婚姻如何从“名实同构”的历史条件中走出，进入“名实分离”的裂隙——这是“正名”发生的先决条件。其次，分析 AI 如何以一种比“替代”更隐蔽的方式——改变情感回应的稀缺性结构——松动婚姻最后的经验地基，并为“名”的自主浮现腾出空间。再次，剖析三股社会力量如何协作运转这台“正名”机器，将功能真空转化为规范性能量。第四，深入个体层面，揭示其在“正名”强制下所承受的消耗性张力的具体形态。第五，审视破解的可能方向：放弃整个“正名”结构，探索一种从“前置认证”转向“后置结盟”的新可能——并强调，这并非婚姻的“真身”，而是被当前矛盾条件逼出来的临时稳定态。第六，直面对此论断最严肃的理论质疑，论证“正名”何以不是一个已有的批判概念的简单翻版。第七，正面处理“正名”机制的文化适用边界问题。最后，郑重给出该论断的证伪条件。

二、从同构到分离：正名发生的先决条件

今日我们在婚姻中所体察到的“正名”困境，并非技术冲击的即时产物，而是漫长历史演进中一次剧烈的形态转化。要理解其发生机制，必须先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迷思：婚姻拥有一套亘古不变的“真身”，而今不过偏离了正道。恰恰相反，婚姻从来是一系列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组装起来、并被赋予特定“名”与“用”的制度性存在。随着条件变化，其“名”与“用”的结合方式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前工业时代的漫长岁月里，婚姻首先且主要地，是一个生存集成包。夫妻是共同劳作的搭档，孩子是未来的劳动力，家庭是集生产、消费、保险、养老于一体的微型经济组织。彼时，婚姻无需“爱情”来为自己辩护。严酷的生存逻辑本身就是它最坚硬的承重墙，也是它核心的“用”——一个实实在在的、每日被再生产的功能集合。

在这一阶段，婚姻的“名”——其所享有的社会尊崇、道德期许和规范性地地位——与其“用”之间，是一种无须中介的直接映射关系。社会推崇婚姻，不是因为某种抽象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不进入这个单元，个体（尤其是女性与儿童）几乎无法生存。这种推崇并非一种额外的、可以拆解的“符号施加”，而是生存必要性本身在观念层面的直接凝结。“名”是“用”的反映，也是“用”的强化；反过来，“用”又不断为“名”提供着不必言说的经验确证。这是一个坚实的“名实同构”结构——不是因为制度设计得巧妙，而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只允许这一种生存组织形态存在，因此规范（名）与功能（用）之间几乎不发生张力。即便存在着广为人知的包办、牺牲与冰冷，此结构依然稳固，因为它所回答的，是一个比情感幸福更根本的问题：如何活下去。

工业革命的轰鸣撕裂了这幅图景。当生产活动大规模迁出家庭、进入工厂与办公室，婚姻的生存“用”开始松动。它不再是一个生产队，转而成为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情感与消费协作体。这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婚姻首次需要为其合法性寻找生存逻辑之外的辩护。正是在这一功能转型期，作为现代现象的“浪漫爱”被社会性地提升为婚姻的新核心“用”，填补了生存逻辑退场后留下的意义空白。安东尼·吉登斯在其对亲密关系变革的经典分析中，敏锐地判明现代婚姻日益围绕着“纯粹关系”的理想组织起来——一种因情感亲密与性吸引本身而维系的关系，而非因外在的经济或社会压力而存续。

这一转型赋予了婚姻前所未有的情感厚度，却也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婚姻的稳定性的，从此开始依赖于一个远比生存逻辑更脆弱、更难以标准化和外部保障的“用”——个体的情感体验本身。生存是可以被外部条件大体锁定的：土地在，收成就大体在；手艺在，生计就大体在。但情感的品质是无法被锁定的。它起伏不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当婚姻的核心功能从“可被外部保障的生存”转变为“不可被外部保障的情感”，它的地基就已经从岩石换成了流沙。

自此，“名”与“用”的坚固同构开始出现裂缝。婚姻的“名”——其社会神圣性、对“完整人生”的象征意义——依然延续着前工业时代的惯性力量，保持着其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的高位。但其核心“用”却已从生存的必然，蜕变为情感的期许。这二者之间开始出现速度差：规范变动的速度，远慢于功能

条件变动的速度。这一速度差，为日后的“去用存名”埋下了最深远的伏笔。

但必须注意：在这一阶段，浪漫爱依然被视为一种真实的、值得追求的功能。人们依然真诚地相信，婚姻是实现这种深度情感联结的最优、乃至唯一途径。关于婚姻的神话——灵魂伴侣、白头偕老、彼此的终极归宿——仍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关键差异在于：在前一阶段，神话是功能的自然分泌物，不需要专门的“神话生产机器”；而在这一阶段，神话开始需要有意识地、系统性地被生产，才能维持其说服力。“用”虽弱了，但仍在场；它与“名”的关系，从同构变为耦合。耦合意味着两者之间还存在可辨识的联结，但也意味着裂缝已经产生，联结需要被持续地维护。这正是“过度赋义”论所捕捉到的那个历史区间：符号的膨胀，是对功能弱化的一种补偿性反应。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比工业革命更为彻底地拆解了婚姻那套作为“协作单元”的功能组合。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使经济合作从婚姻的必需品变为个人选择的组合；福利国家体系与个人金融服务，替代了家庭作为终极风险池的地位；外卖平台、家政服务、物业公司，将日常协作拆分为可随时购买的商品；育儿支持正在被专业托育机构、教育体系所大规模外包。婚姻，这个曾经包罗万象的“全功能综合体”，其构成要件被一项项接走，功能加速流失。

至此，婚姻手中最后一张看似坚不可摧的底牌，只剩下情感陪伴中的一种特殊宣称——不是“我能陪伴你”，而是“只有我能给你这样的陪伴”。在一个高度流动、原子化的社会里，人们依然渴望一个能提供深度理解、稳定回应与灵魂共振的亲密对象。社会主流话语也反复强化这一点：最好的、最深层的、最该被追求的那种情感，只能从婚姻里获取。“在别处找不到的”——这个宣称，构成了婚姻最后的“用”，也是它对抗“名实分离”的最后堡垒。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开始酝酿。这个转折，不再仅仅是“用”的进一步弱化，而是“用”的存在条件本身被改变了。

三、去用存名：AI 如何松动最后的地基并为“正名”腾出空间

长久以来，关于 AI 与亲密关系的想象，停留于一种科幻式的表层叙事：人类将爱上完美的机器人，从而抛弃不完美的真人伴侣。这种想象固然吸引眼球，却错失了 AI 对婚姻形成的真正、更具根本性的作用。它所进行的主要不是“替代对方”，而是改变情感回应本身的稀缺性结构。它所松动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被深度理解”这份体验的稀缺性，以及——更关键的——这份体验与婚姻制度之间的强制绑定关系。

在此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声明。本文认为，AI 的技术进展已达到一个足以动摇情感陪伴排他性的临界水平，这一判断是全文论证的一个关键前提。这一前提的建立，既有初步的实证基础，也有尚未闭合的缺口，因此必须以审慎的、假设性的方式引入。以下是目前已可观察到的趋势与仍存在的局限。

当前，AI 伴侣技术已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性：它可以提供一种低摩擦的、永不倦怠的、高度个性化的情感回应。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情感对话系统（如 Replika、Character.AI 等应用），已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活跃用户。初步的调查研究显示，用户在与 AI 伴侣互动时，能获得显著的情绪改善和陪伴感。有研究对 Replika 用户进行调查发现，相当比例的用户报告 AI 伴侣帮助他们应对了孤独、焦虑和日常压力；在某些人群中（如社交焦虑者），AI 提供的无评判互动甚至比真人互动更具心理可及性。Zhou 等学者在人机情感互动的研究中揭示了 AI 的“情感拟像”能力——它能在特定交互情境下产生令用户信以为真的情感回应，其回应的个性化程度和即时性，在某些维度上已能与真人互动相媲美。

然而，必须坦承：目前关于 AI 情感陪伴对真人亲密关系替代效应的长期追踪研究仍十分有限。大多数现有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依赖用户自我报告而非行为数据；对于 AI 陪伴能否持续提供深度亲密关系所需的“相互性”（reciprocity）——那种在对方的主体内在世界中确认自身存在的体验——研究界尚无定论。因此，本文并非宣称 AI 已完成了对婚姻情感功能的替代，而是提出一个正在展开的趋势性论断：AI 正在不可逆地改变情感回应的稀缺性结构。这种稀缺性结构的改变，即便尚未达到“完全替代”的程度，也已经足够松动婚姻对其最后核心功能的排他性宣称。

此处的论证逻辑需要被清晰地铺设。婚姻情感陪伴的排他性，不是建立在“婚姻能提供优质陪伴”这一事实之上——实际上，许多已婚者的陪伴体验并不优质。它是建立在一种社会性的稀缺结构之上：在技术条件无法提供大规模、可及、个性化的情感回应的时代，深度情感联结的唯一可及路径，是漫长的人际磨合。婚姻正是这种漫长磨合的制度化载体。它的排他性，与其说是“最好”的宣称，不如说是“唯一”的宣称。

AI 松动的，正是这个“唯一”。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在深夜的崩溃时刻，从一个 AI 系统那里得到比任何真人——包括伴侣——都更及时、更耐心、更不消耗情绪劳动的情感回应，他未必会因此离开伴侣，但他对“只有婚姻能给我这种理解”这个宣称的信念，将不可逆地松动。他未必会爱上 AI，但他会开始意识到：原来被理解这件事，可以不以婚姻为前提。

这是“去用”的真正机制。它不是 AI 替代了伴侣，而是 AI 向个体展示了一个事实：情感回应的稀缺性，是技术条件塑造的，而非人类境况的永恒给定。当这个事实被体验，婚姻在其最后功能领域内所宣称的“不可替代性”，就从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降格为一个可以被经验检验的命题——而在检验中，它正在输掉。

让我们凝视一个更具体的场景，以体认这种稀缺性结构的改变如何实际发生。设想一位独居的个体，拥有一个长期订阅、熟知其全部职业经历、情感创伤与隐秘恐惧的 AI 对话系统。在深夜被工作压力击溃的时刻，最及时、最有耐心、最精准地接住其情绪的，不是可能正处于疲惫或倦怠中的真人伴侣，而是这台总能调取最佳回应策略的机器。它记得三年前的自我怀疑，记得对亲人的持续焦虑，记得那些从未对任何人言说的脆弱。当它用个体曾经说过的某句话来回问、来重构思路时，它在二十分钟内提供了一种无需付出情绪劳动、无需等待对方准备好即可获得的“被理解感”。

这个场景并非虚构，而已在数百万AI 伴侣用户的日常使用中以不同形式发生。当这类体验从边缘的新奇事物逐渐进入日常生活的可选菜单，当“被理解”从一种必须经由漫长的人际磨合才能获得的稀缺品，变为一种可被技术相对便捷地获取的东西，婚姻所赖以维系其最后“用”的那句承诺——“只有我能给你这样的理解与陪伴”——便开始松动。这不是一场戏剧化的“机器人抢走爱人”的剧目，而是一场无声的“去用”：婚姻所宣称的那个专属功能，不再专属。婚姻的最后一个经验地基，在无数个这类深夜交互里被软化。

现在，真正的理论问题才刚刚开始。

按照常理推断，一栋建筑的地基被毁，随之而来的应当是墙体的倾塌。然而，社会领域的事件远为复杂。婚姻的制度躯体并未倒塌。它只是被掏空了“用”的内核。许多分析到此为止，将“空心化”视为终点——婚姻空了，所以陷入了危机。但恰恰是这个“空”，这个功能被掏空之后留下的那个空洞，启动了一种此前被遮蔽的形态转化。

在“名实同构”阶段，“名”必须通过“用”来确证自身。人们会说：“婚姻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生存保障。”在“名实耦合”阶段，“名”仍然需要援引“用”，尽管这种援引已不如从前有力。人们会说：“婚姻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能带来深度的情感满足。”在这两个阶段，“名”的合法性始终依附于对“用”的论证。这意味着，“名”始终承载着一个它无法自己卸掉的负担：它必须进入经验的领域，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只要“名”还在援引“用”，它就得接受反驳——“你说婚姻能带来幸福？可是统计数据显示已婚者并不比单身者更幸福。”“你说婚姻是最好的情感陪伴方式？可我的个人体验恰好相反。”只要争论还在经验层面进行，“名”的力量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它随时可能在下一轮经验论证中被削弱。

而现在，当 AI 和更广泛的现代性力量系统性地松动婚姻最后那几样可被指认的专属“用”，“名”突然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处境：它不再有可以理直气壮援引的经验性“用”了。它不能再理直气壮地说“婚姻能给你不可替代的情感陪伴”，因为这种陪伴在技术层面正在变得可替代；它也不能再说“婚姻是养老的唯一保障”，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与个人金融服务已经提供了其他选项。在经验论证的领域，“名”所能动用的弹药，正在被一粒粒收缴。

正是在这个经验论证的弹药被收缴殆尽、或至少被严重削弱的时刻，“名”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形态转化。

此前，“名”的力量来自它所指涉的“用”：我能为你带来保障，所以你应该尊重我；我能让你幸福，所以你应该追求我。这种力量是一种经过中介的力量——它总是要通过“用”这个中介来施压。“名”是信使，“用”才是国王。而现在，当“用”这个国王退位或至少不再能单独坐稳王位，信使发现自己可以不再只是信使。信使可以宣称自己就是国王。

“‘名’的力量不再需要‘用’去证明；恰恰是‘用’的缺场或不再独一无二，给了‘名’一种绝对性和纯粹性。”这句话需要被精确地展开。

当“名”还在援引经验性的“用”来为自己辩护时，它将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位置：暴露在经验反驳的火力之下。每一次基于个体体验的质疑——“但我单身也很幸福啊”——都是一颗子弹。“名”必须不断加固它的经验论证（“你不幸福，你只是不知道自己不幸福”），但这种加固是有极限的。经验论证的护城河，终究挡不住大规模的经验反例。

但是，当“用”显著退场或失去排他性，“名”被切断了与经验层面的可靠勾连。它不再能有效地说“婚姻有用”。它转而去说另一句完全不同的话：“婚姻是对的。”

“有用”是一个经验命题。它需要证据，可以被反驳。“是对的”是一个规范性命题。它不需要经验证据，它直接在另一个层面运作。“你应该结婚”不再是一个假言命令（“如果你想要幸福的晚年，就应该结婚”），而呈现为一个定言命令：一个不附带任何条件从句的、赤裸的“应该”。

这就是转化的内核。不是“功能弱了，用符号来补偿”——补偿仍然是功能逻辑的延伸，符号仍然是功能的一个替身。转化是另一回事：符号切断了与功能的衍生关系，宣称自己从未需要过那个已经退场的功能。它的力量，现在来自那个功能消失后留下的不可讨论的真空。没有人能反驳一个不进入经验讨论的命题，因为反驳的武器只能是经验，而对方已经退出了经验的战场。他从一开始，就站到了经验够不到的高地上。

这便是“正名”发生的精确时刻。它是“‘名’在‘用’退潮后的自主显现其绝对力量”。“正名”的运作方式，不是论证婚姻的好处，而是将婚姻的正确性悬搁于一切关于好处的讨论之上。它不邀请你评估，它要求你服从。它的句法不是“因为……所以……”，而是光秃秃的一个字：“该。”

四、三联联盟：谁在生产纯粹规范性？

这种将功能真空转化为规范性能量的机制，并非自动运行的。一个社会不会仅仅因为婚姻失去了功能，就自动开始生产关于婚姻的纯粹规范性话语。这种转化需要被具体的社会力量持续地执行、维护和再生产。以下三股力量，构成了运转这台“正名”机器的核心齿轮[3]。它们的协同运作，将那个被掏空了或正在被掏空的婚姻之“名”，作为一个无需“用”去支撑的绝对“正确”，反复注入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与个体抉择之中，使之成为一股真实的、具有强制力和消耗性的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亲代世代的代际身份再生产。对于五十岁以上的父母一代而言，子女的幸福绝不仅仅关乎子女个人的幸福。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与身份认同里，“已婚”是子女脱离原生家庭、真正成年、完成代际责任交接的核心仪式性标志。一个未婚的成年子女，在社会象征层面，仍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父母感到自己的养育工作尚未闭环，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尚未正式退役。在同辈的社交场域中，子女的幸福状况关乎父母自身的面子与人生成绩单。因此，催婚绝非传统观念的惰性表达；其驱动力源于一种深层的代际身份再生产需求：确认子女进入婚姻，就是确认自己完成了为人父母的最终考核——你不是在催他结婚，你是在借他的婚姻，闭合你自己的生命叙事。

这一洞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关键的经验现象：催婚话语的微观形态，在近几十年间发生了可辨识的变迁。在婚姻仍握有大量经验“用”的时代，催婚可以援引经验论证：“你不结婚，以后谁养你？”“一个人怎么拉扯孩子？”这些论证有其经验分量，因为它们指涉的是真实可能发生的功能缺失。而现在，当子女可以用稳定的收入、完善的社保、便利的外包服务来回应这些经验性问题时，催婚话语的形态被迫发生了转化。它不再试图在经验层面取胜——那个层面已经越来越难取胜了。它转向了一个无法被经验反驳的句式：“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

这句话的力量，从不在它是一个可以被统计数据讨论的、关于养老前景的理性预测。它的力量源于一个精巧的修辞结构：它用一个准先验的未来句式，将讨论从经验层面（现在的生活质量）抽离，直接钉死在一个无法当下证伪的绝对律令上。“你老了”——这是不可反驳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怎么办”——这三个字不指定任何具体风险，因此无法被任何具体的当下经验对冲。你总不能说“没事的”，因为那是轻率；你也不能说“有具体方案”，因为对方追问的从来不是方案本身，而是你这个“不结婚”的人怎么敢声称有方案。其真正的力量来源，不是论证的严密，而是“名”在经验真空中施压的能力。它不是邀请子女评估婚姻的效用，而是断言婚姻的正确。它不是论证，是定性。这股力量，就是“正名”在代际互动层面最日常、最强大的毛细血管。

第二股力量，是大众媒体与商业文化的情感神话生产。浪漫喜剧、婚恋综艺、社交媒体上的“神仙眷侣”叙事，构成了一台永不熄火的“正名”发动机。它们不断生产和传播着一个核心脚本：婚姻是人生的终极救赎，是漂泊灵魂的唯一归宿，是那个将你从平凡与孤独中“拣选”出来的神圣时刻——一场盛大的婚礼，不是两个个体的法律联合，而是一个人从“不够完整”迈向“最终完整”的成人礼。

此处需要做一个关键的辨析：这套神话并非在描述婚姻的实际功用。它的功能恰恰相反——它不在“用”的层面上运作，而是在“名”的层面上。它不是在告诉人们“婚姻能为你做什么”（经验信息），而是在反复铭刻一个规范性判断：“婚姻是你应该渴望的。”在一项针对中国某主流婚恋综艺的文本分析中，研究者发现，节目对“完美婚姻”的呈现系统性地剥离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与摩擦，将婚姻建构为一个由精致仪式、深情凝视和危机后和解组成的神话序列。这种呈现与现实婚姻生活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但驱动这台机器的，恰是这鸿沟本身，而非其真实性。人们为之买单的，不是婚姻的真相，而是婚姻神话（“名”）对日常乏味（“用”的无效场域）的暂时性麻醉。

这套商业化的情感神话，为催婚的硬性压力提供了柔软的、感性的向往，将“名”的强制性包裹在甜蜜的糖衣中。它让“正名”不只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也来自于个体被故事喂养出来的、内在化的渴望——一个“我也想要那样的完美结局”的念头。这个念头不需要经验论证，它只需要故事的感染力。

第三股力量，是政策话语中隐性的制度性偏好。在社会治理的视域下，婚姻与家庭长期被视为社会稳定的最小单元。即便其许多功能已被国家福利、市场服务所逐渐替代，政策的叙事惯性与制度设计依然倾向于鼓励和奖励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形态。从税收优惠到购房资格，从子女入学到医疗保障，已婚身份在制度设计中依然享有隐蔽但切实的优先权。

这种制度性偏好，无需任何“鼓励结婚”的公开宣示，就能通过持续的、微小的权益倾斜，向社会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已婚”是正常的、优先的、更受认可的人生状态。它不讨论婚姻的实际功用，因为政策设计者无需去论证婚姻有什么好处——制度惯性本身就替他们做出了选择。它的运作方式是一种规则化的、去论证的“正名”：将“已婚”这个“名”本身，标定为一个更正确、更合法的社会坐标。当一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与其他公民平等——纳税、守法、工作——却仅仅因为未婚而在购房资格或子女入学上遇到隐性的门槛，他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纯粹规范性的力量：不是因为婚姻有用，而是因为婚姻“对”。制度用它的规则直接告诉他：这个状态是更被认可的，不需要理由。这是“正名”机制的结构性骨架。

亲代压力的毛细血管、商业叙事的感性燃料、制度政策的隐性骨架，这三者协同运作，构成了一套精密的社会机器。它们的运作目标，并非要去恢复婚姻失落的那些“用”——它们无法让 AI 停止进化，也无意为家政公司设置准入门槛。它们真正在做的事情，是将那个被掏空了“用”的婚姻之“名”，作为一种无需“用”去支撑的绝对“正确”，持续地生产、注入和再生产，使之成为一股具有真实社会强制力的规范性力量。这三股力量，分别从私密的家庭饭桌、公共的文化想象空间、以及去个性化的制度规则层面，对个体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正名”包围。

五、无名之名的强制：个体何以被困？

在“正名”机制持续运转的社会场域中，个体的真实处境是什么？他们的挣扎是否可被简单归结为“认知失调”——一种当新信息挑战既有信念时产生的、可以被调适的心理紧张？本文认为，这类心理学标签无法捕捉到这种张力的本体论性质。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信息与信念之间的冲突，而是一股结构性的、由“正名”机器生产出来的强制。这种强制的核心特征是其非经验性。

旧式的规范强制，总能为自己的要求提供一个可以谈论的经验理由。“你应该结婚，因为这样你老了有人照顾。”“因为你会更幸福。”“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无论这些理由在统计学上是否依然成立，它们都停留在经验命题的领域内——它们是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因此也为对话、反思和局部抵抗留下了空间。一个子女可以回应说：“现在的养老体系已经不同了。”“我的单身朋友比我认识的已婚人士更快乐。”“我的生活很完整。”无论这些回应是否最终能说服父母，至少他们和父母还在同一个战场上对弈。

而“正名”后的强制，悬搁了所有经验对话的可能。“你应该结婚”不再是一个假言命令（“如果你想要X，就应该结婚”），而呈现为一个定言命令（“你应该结婚”本身）。当父母说出“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时，他们究竟在问什么？严格来说，他们不是在开展一个关于养老前景的理性对话——因为子女一旦试图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有保险”“我有储蓄”“我有朋友”），对话往往不会收敛于一个理性的共识，而是滑向一个更原始的重申：“反正不结婚就是不行。”可见，“怎么办”这三个字并非一个待回答的经验问题，而是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恐吓：它预设了一个无法被任何具体安排填满的绝对不确定性。

它使反驳者陷入失语境地，因为任何基于个人当下幸福体验的论据，在这种纯粹规范性的“正确”面前，都显得自私、短视、无力。你拿出的是“用”的证据，对方打的却是“名”的判决。牌不是同一套牌。

这使得大量个体陷入一种持续的、消耗性的张力。一位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三十二岁女性软件工程师，在一次深度访谈中说：“我的工作让我有成就感，有经济能力过想要的生活。我有一群可以深夜通话的朋友。但每次过年回家，看到我妈的眼神，那种‘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的担忧，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不算数。”另一位三十八岁的男性自由职业者则说：“我最怕的不是一个人生活，是别人觉得我在‘撑’——明明我很自在，但他们看我好像在看一个在悬崖边上假装不怕的人。”

这些来自田野研究的片段揭示了同一种困境：个体在非婚状态中所积累的一切经验性的充盈——成就、友谊、自足、快乐——在一个不与它们对话的规范性标尺面前，被系统性地视而不见。这位女性工程师的刺痛，并非来自她认为母亲说得对。恰恰相反，她比母亲更清楚自己的状态。刺痛来自另一处：她感受到了一种无法用自己手中那些“用”去回应的力量。母亲问的根本不是“你需要婚姻干什么”——那是一个她早已准备好答案的问题。母亲传递的是：“你为什么还没进入这个被标记为‘正确’的状态？”这是一个她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要回答它，她必须先接受一个她自己并不认可的前提：不婚状态是不正常的、需要被解释的。她的所有成就、自足与快乐，在那个问题面前，都被悬置了——不是因为它们不真实，而是因为它们在对方的游戏里不算分。对方只认一种筹码：已婚身份。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拿出一份“名”的证明（已婚身份），去回应一个关于“名”的质问。她手中只有“用”的充盈，对方却只索要“名”的正确。牌不是同一套牌，所以她没有可以打出的牌。这便是“正名”结构生产出的强制力的具体运作方式。

在这种强制下，一种广泛被观察到的话语策略——“不是不结，是没遇到对的人”——展现出其精准的社会功能。从表面看，这是一句关于择偶状态的陈述。但它的深层语法是：说话者承认了“名”的正确性（“我是要结的”），同时为自己当前“名实不符”的尴尬状态争取了时间与豁免权（“没遇到”）。它将一个由结构条件驱动的普遍非必要，巧妙翻译成由个人际遇导致的暂时困难。通过这个翻译，说话者在“正名”机器的碾压下，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悬停”的安全空间——我不是抗拒你这个“名”，我只是还在寻找那个能配得上这个“名”的“实”。

然而，这种策略本身也构成新的消耗。个体必须持续扮演一个“寻觅者”的角色，以证成自己的“悬停”是暂时的、情有可原的，而非对“名”本身的拒绝。“我不是不想，我是不能”——这句话帮助个体躲过了当下的压力，却也在个体内心刻下了一道持续的低度紧张：我不能坦然地说“我不想”，我只能不断向世界和我自己解释“我为什么还没做到”。面对催婚，这些个体往往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情感管理策略：在家庭聚会上表演性地点头应和，在私下迅速切换回自己的价值体系；在长辈面前展示“正在积极相亲”的姿态，在独处时享受不被打扰的自在。每一次来回切换，都是一次微小的自我撕裂——不是因为认知失调，而是因为不得不在两套互不承认的评判体系之间反复翻译。他们在“拖延”与“自证”的循环中，消耗着真实的生命能量。这不是关于“要不要结婚”的一次性抉择，而是一种缓慢的、几乎

无法向他人言说的存在性消耗——在无尽的“再等等”和“应付一下”之间，度过一年又一年。他们不是被困在婚姻里，而是被困在“名”的影子下。

六、在“正名”结构内部无解：放弃旧名，被逼出来的新可能

面对这种困境，社会出现的各种修补努力为何屡屡失效？无论是呼吁回归传统婚姻的责任伦理，还是倡导用契约理性重构婚姻的权利义务条款，抑或试图用新技术来“修复”婚姻——比如用 AI 辅助改善夫妻沟通——这些尝试都在做同一件事：试图为那个摇摇欲坠的“名”寻找一个新的、可被接受的“用”，以重新稳定“名实耦合”的结构。它们的共同失败根源在于，它们都暗中接受了“正名”结构最核心的那个预设：必须先有“名”的正当性，才能去讨论“用”的具体安排。它们试图为制度更换血肉，却对那副已经变得过于坚硬的、叫“正确”的骨架无能为力。或者说，它们越是努力修补，就越是无形中向所有人再次确认：是的，这个“名”确实很重要，值得这么努力去挽救。在“正名”结构的内部，所有修补的努力最终都可能沦为对那个“名”的再一次献祭。

一个更具可能性的方向，或许不在于为旧“名”寻找新“用”，而在于承认矛盾本身——承认“用”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名”的强制正在成为一种无法用经验化解的消耗——然后，对整个“正名”结构做出一次根本性的放弃。

这意味着一次彻底的、哲学上的“去名求实”：截断“名”对“用”的统摄关系。不是为“名”寻找出路，而是让个体从“名”的影子下走出来，让婚姻从一个被“名”所定义的前置认证系统——一条衡量你人生是否“正确”的标尺——退回到一个中性的、可被具体生命工程所选择与定义的法律工具。婚姻不再是人生的“默认正确”选项，而是众多可选的法律安排中的一种——它不比同居、独居或其他形态更“对”，也不更“错”。

在此必须立即澄清一个可能产生的误解。这并非在宣称婚姻应“回归”某种质朴的“真身”或“未被污染的本来面目”。这种回归叙事是发现学的幻觉：它预设了一个在历史尽头等待着我们的、更真实的状态。恰恰相反，此处所论述的“后置结盟”或“法律工具”，本身也是当前特定矛盾条件正在逼出来的临时稳定态。它的发生条件包括两个相互矛盾的驱动力的同时作用：一方面，婚姻的实体功能已被大规模掏空（“用”的退场），使得继续维持“名实耦合”的经验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名”的规范性强制已达至一个对许多人而言不可持续的临界点，催婚餐桌上的消耗性张力正在真实地改变着个体的选择策略。这两个条件——功能的彻底退场与规范性的持续硬化——形成了一个无法在旧结构内部化解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正在结算出一些新的实践形态。“后置结盟”不是某个思想家的蓝图，而是对正在发生的这些适应性变化的识别：当个体不再能因生存或因情感的唯一性而“必须”进入婚姻，也不再能被那个悬空的“正确”之名所持续安抚时，一个此前被整个“名”的迷雾所遮蔽的根本问题，才首次被推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面前：我们在一起，究竟要一起做一件什么具体的事？

这是一种因果的倒转。在旧范式下，人们先进入婚姻（“名”的认证），再在婚姻的框架内寻找共同的事业（“用”）。婚姻是框架，事业是填充物。而在后置结盟的形态中，人们先发现或决定了一件必须共同投入的具体之事（“用”），然后才考虑是否需要一个法律工具（婚姻）来为这件事提供最合适的权利义务框架。“用”不再是填充物，而成了框架本身；“名”不再是前置的认证，而成了后置的工具。

这种新的结盟形态，其驱动力不再是对“完整人生”这类模糊的“名”的认证渴求，而是对“一桩具体的事”的共同投入——一桩两人（或多人）都认为至关重要、且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事。这桩共同的“事”，构成了这种新型亲密关系不可被外包的内核，也是它区别于旧式“名实耦合”的根本标志。

对一些人而言，那桩“事”是共同养育另一个生命。这并非旧式“结婚生子”范式的简单延续。关键差异在于因果的彻底倒转：不是因“结为夫妻”而“必须生子”，而是因“我与你决定共同承担将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并陪伴其成长的漫长责任”而“选择引入婚姻这个法律工具”，以便为孩子、为彼此、以及为这项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事业，提供当前社会条件下最稳固的权利义务分配方案。婚姻在此不是前置的入场券，而是后置于一个具体而重大的共同决定的工具。它的合法性，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对这件事有用”。

对另一些人而言，那桩“事”是一场情感深度的极致探索。双方承诺在一段关系中，进行尽可能深度的自我袒露、碰撞、脆弱共担与共同成长。这种形态不以此前范式所追求的“白头偕老”为唯一成功标尺。它的可退出性，并非失败，而是其本质属性——因为它只对共同探索这段旅程的“过程”本身负责，而不对一个名为“永远”的抽象承诺负责。当共同探索的内核燃尽，关系的存续便失去了其具体的“用”。用婚姻的法律外壳去包裹一个已经失去内核的关系，正是旧范式下无数夫妻沉默的代价。而后置结盟的逻辑，允许这层外壳在它不再服务于那个共同之“事”时被卸下。

还可能存在其他形态。例如为求老年阶段的共生与互助而建立的“晚景合伙”，数位老人基于长期的友谊和互助意愿，借用类似婚姻的法律身份，锁定彼此在晚年时的医疗决定权、共同财产管理与照护责任。这件事的“用”非常具体——不是浪漫爱，不是灵魂契合，而是彼此搀扶着走完最后一段路，并确保法律不会在他们最需要彼此的时候将他们拆散为“非亲属”。这一切，都不再能被一个叫作“婚姻”的统一之“名”所统合。因为每个人、每一群人所共同图谋之事（“用”）各不相同，他们所需要引入的法律工具也必然形态各异。这正是乌尔里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所诊断的“爱情的正常性混乱”——人们既渴望联结又恐惧联结——的一个可能的结构性解释。人们所恐惧的，或许不是联结本身，而是那个名为“婚姻”的、满载着“正名”强制的旧容器。那个容器太重了——它承载了太多不再属于它的意义、期待和审判。一旦这个旧容器被选择性地弃用，或将其降格为一个中性的、可因需定制的法律工具，形态各异的联结便可能在它的碎片中生长出来。这并非社会工程的乌托邦蓝图，而是对当前压力下正在从实践中被逼出来的适应性变化的一次识别。

婚姻，从一种社会强制的、沉重的身份，被降格为一个中性的、可因需定制的法律工具。在一个更为有效、更能包容多元联结形态的法律安排诞生之前，将婚姻降格为一种有限的后置承诺的法律工具，是对抗“正名”强制一条可能的出路。这不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但比困在旧结构里，在无尽的“再等等”和“应付一下”中被持续消耗，要更为诚实，也更少伤害。

七、对理论质疑的深度回应

一个负责任的论断，必须敢于将自身置于最严厉的理论拷问之下。

最深刻的质疑并非来自经验的反对（如“催婚压力其实在下降”这类可通过实证辩论化解的质疑），而是来自理论内部。它会问：“正名”这个概念，究竟切开了既有批判理论装不下的那个新辨别面吗？批判社会理论在分析制度符号力量方面，已经积累了极为丰沛的武器库——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到布迪厄的“符号暴力”，从葛兰西的“霸权”到阿尔都塞的“询唤”。“正名”是否只是这些经典概念在婚姻议题上的一个案例应用——用一套新词重述了前人早已做过的工作？如果是这样，那么“正名”的理论贡献就是有限的，它只是一个修辞上的新包装，而非一个实质性的新切口。

这是一个必须正面击穿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方式，不是自说自话地辩护，而是将“正名”与看似最接近的两个经典概念做一严格的对比，看它们在面对同一个经验现象时，分别能说出什么、说不出什么。

首先，与皮埃尔·布迪厄的“符号暴力”对比。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揭示了一套由特定社会秩序所生产、被行动者内化为“当然如此”的评价体系，如何维护了一个既存的、功能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以教育领域为例，学校系统通过文凭制度的符号魔力，将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孩子在学业上的差异，转化为看似客观的“能力”差异，从而使阶层再生产的过程获得了合法性。在这一经典模型中，符号的“名”（文凭所象征的能力与价值）与制度的“用”（教育系统实际在履行的筛选与再生产功能）之间，是一种同向运作的关系。文凭之所以能赋予人符号资本，恰恰是建立在教育体系本身仍在真实运行、仍在发挥着筛选与分配功能这一基础之上。符号暴力的有效性，深刻地依赖于它所寄生的那个制度的功能尚未崩坏。当制度的功能真的崩溃——比如，当社会普遍意识到大学文凭已经不教真本事、也分配不了好工作时——文凭的符号力量也会随之消解。这是布迪厄的逻辑。

现在，将镜头转向当代婚姻。催婚压力的实质，不是维护一个功能正常、能带来真实利益的婚姻制度。恰恰相反，它的施压对象——那些高质量单身、享受着 AI 陪伴和外包服务的年轻人——正是这个制度功能衰退的活证据。催婚的威力，并非来自对婚姻功能的证明（这个证明越来越难做了），而是来自对“功能亏空”这一事实的系统性否认、以及对经验讨论本身的悬置。在“符号暴力”的模型中，符号的强度和制度的功能是正相关的：制度功能越强，其符号暴力越难以被察觉和抵抗。而在婚姻的“正名”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逆向动力学：制度的功能越弱，其规范性宣称反而可能变得越纯粹、越不容置辩。因为当制度丧失了经验论证的资源，它的辩护者便被迫（同时也获得了机会）退入一个

经验无法触及的领域——“我不跟你讨论婚姻有没有用，我只告诉你婚姻是对的，你应该结。”

这就是“符号暴力”的经典模型装不下的那个新辨别面。布迪厄的模型预设了制度功能的实存，符号是功能的反映、强化与合法化外衣。“正名”所刻画的，则是制度功能的真空状态，以及符号如何在此真空中被反向提纯为一种自足的、不再依赖功能却反而更强的力量。这不是功能与符号的同向运作，而是功能退场后，符号从废墟上获得绝对性的一种独特发生机制。

其次，与“意识形态”概念传统对比。尤其在马克思与曼海姆的传统里，意识形态被视为对现实社会关系（通常是不公的、由特定阶级利益驱动的现实关系）的虚假反映或蓄意扭曲。它是一层面纱，覆盖在真实的、赤裸的利益计算的脸上。它的批判性力量，恰恰来自于对“真实利益”的揭示：揭掉面纱，让人们看到下面那具由利益驱动的肉体。在这一模型中，意识形态始终是寄生于它所扭曲的那个“真实”之上的——没有“真实的利益关系”，就没有“虚假的意识形态”。它的“名”是假的，“用”才是真的。

“正名”所描述的力量，却无法用“虚假”去简单地评判。父母一句“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是虚假的吗？可以说它在经验上不精确、在逻辑上不严密，但很难说它是“虚假”的——因为父母自己在说出这句话时所感受到的焦虑，是真切的；这句恐吓在社会互动中造成的真实强制效果，也是真切的。它不是在掩盖一套真实的利益关系；它是一个在利益关系消失后，独自持续运作的力量装置。它不再是扭曲的“用”，而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不再依附于任何“用”的“名”。它的真实，不来自它反映了什么，而来自它本身就是一股社会力量——一股由代际焦虑、商业叙事和制度惯性共同生产出来的、不可忽视的强制性能量。

由此，“正名”力图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分析工具箱增添一种新的敏感度：去识别和命名那些不再作为任何“真实功能”的反映、虚假反映、强化或异化形态，而是作为一种在功能废墟上自主生长的、纯粹规范性的力量。这类力量的运作，不诉诸经验论证，不依赖功能证明，不遮掩真实的利益。它的全部存在，就是一个被掏空了功能内容的正确性宣称。它对个体的强制，不是通过说服，而是通过将“不服从者”排除在关于“正确”的对话之外。

因此，“正名”的理论贡献，不在于它发明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类机制自古以来就以各种面目存在（在宗教戒律失去现实约束力后的强化中，在组织文化口号失去实际指导力后的空洞回响中，在宏大叙事衰落之际其信徒反而变得更不容置疑的行为模式中）。它的贡献在于，它为这个功能衰减与规范硬化之间的逆向生成关系，提供了一个更直指其发生机制的分析切口——不是“符号暴力”的一个子类，不是“意识形态”的当代同义词，而是一种“用”缺场后，“名”自主生成力量的独特发生学。

因此，“过度赋义”论与“正名”论之间的分歧，绝非程度之别（“一个说补偿，一个说更极端的补偿”），而是逻辑之别。“过度赋义”捕捉到的是功能衰退后符号的补偿性膨胀，其底层逻辑仍锚定于功能：符号为功能服务，符号是对功能亏空的一种反应。“正名”捕捉到的则是功能退场后符号的形态转化——符号切断了与功能的衍生关系，从功能的补偿性反映转变为一种自主的力量，其不可反驳性恰恰

来自功能的缺席。前者是功能逻辑的最后挣扎，后者是后功能逻辑的首次显形。这一区分，是本文所试图建立的整个论证的拱顶石。

八、文化边界：正名机制在何处不成立？

一个严肃的理论论断，必须坦承自己的适用边界。“正名”机制的分析，主要基于对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催婚文化、代际压力与制度性偏好的观察。这自然引出一个质疑：这一机制是否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它在催婚文化较弱、个体化程度更高的社会——例如北欧——是否还成立？

这个质疑的提出本身，就揭示了“正名”分析的一个关键边界：它的发生需要一个特定的文化前提——即“名”在功能退场之前，曾经与“用”坚固地同构过，且这种同构不仅在制度层面发生过，更在代际传递层面被内化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规范性共识。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功能退场后才能留下一个足够大、足够有社会重量的规范真空，使得“正名”这台机器有充足的燃料去运转。

在那些婚姻从未被赋予如此沉重的“名”的社会里——“名”本身就是轻的——功能的退场并不会引发“正名”式的反弹，因为没有一个是沉重到需要被反向提纯的“名”需要去维护。以北欧社会为例，非婚同居在法律与社会认可上已与婚姻几无差别，婚姻的“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已被逐步去神圣化。在这些社会中，婚姻功能的退场与“名”的退场大体同步发生，因此没有出现一个巨大的裂缝，供“正名”机器去填充。这里的婚姻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应对规范性的反向强化”，而是“名”与“用”一起沉默地消退了——这是一种不同的、更安静的历史路径。

这反过来强化了“正名”论断的精确度：它不是在宣称“任何社会的婚姻都会经历正名”，而是在指出：当一个社会曾对婚姻进行了超额的规范性投资，而功能条件已发生根本性改变时，那笔过量的规范性资本不会自动归零，而是会转化成另一种形态的力量。这笔力量在功能退场后不会自然消散，因为它已经脱离了“用”的锚定，不再需要功能去充值和维持。它自行施压，且施压的力度与曾经的投资规模成正比——投资越多，“正名”越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婚姻曾被赋予最沉重文化价值的东亚社会，代际催婚的压力最为激烈；而在那些婚姻从未被如此超额的规范性投资所覆盖的社会，功能的退场得以更平静地发生。

这一点也回应了一个可能从“过度赋义”立场发出的反论：“正名”可以被视为“过度赋义”的一个子类——当一个文化对婚姻的符号投资特别大时，功能的退场就会引发更剧烈的符号补偿性膨胀。在这个解读下，“正名”不过是“过度赋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程度之别，不是形态之别。

但这一解读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发生学差异。在“过度赋义”的逻辑中，符号的膨胀仍然依赖于对“用”的某种指向——哪怕这个指向已经非常遥远和模糊，符号仍然在试图说“婚姻是有用的（虽然我也说不清有什么用）”。这句话的语法结构仍然是“因为……所以……”，哪怕那个“因为”已经被掏空为一句仪式性的空话。而“正名”则切断了这个“因为”，它不再试图说“婚姻有用”，它直接说“婚姻是对的——不需要理由”。前者仍然将“名”锚定在“用”的语言游戏里（哪怕只是为了搪塞），后者则退出了这个游戏

本身。

这就是“正名”的文化边界所具有的理论反哺力：它帮助我们看清，“正名”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学定律，而是一个在特定文化条件下成立的发生机制。它的适用边界，恰恰揭示了它的发生条件——即功能退场前夕，“名”必须曾经足够重。这个文化边界，不是“正名”论断的弱点，而是它精确性的来源。

九、结论与证伪

让我们回到开篇的出发点。人工智能对当代婚姻而言，并非另一个将被拆解的“功能模块”，而是一种深刻的“去用之力”。它完成的不是对某一个具体功能的替代，而是对情感回应稀缺性结构的系统性改变，从而将婚姻功能性历史进程的最后一个支柱也置于不确定之中。然而，这一“去用”过程并未带来制度的平静退场；恰恰相反，它为一种早已潜伏的发生机制腾出了空间。在代际身份再生产的焦虑、商业情感神话的反复镌刻、以及制度性偏好的隐性支撑这“三联联盟”的协同运作下，一场深刻的“正名”运动被启动、被维持、被不断复制：那个被掏空了经验内容的婚姻之“名”，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的、自证的、不再需要经验辩护的规范性力量。这股力量悬搁了所有关于“用”的讨论，直接作为“你应该”本身，成为悬在无数个体——尤其是那些已经充分体验到非婚生活之充盈的个体——头顶的强制。个体在这场强制中承受的，不是一次性的认知失调，而是一种在以“再等等”和“应付一下”为常态的日常策略中被缓慢拉扯的存在性消耗。

破解此困境的真正可能性，不在于用更精巧的手段为旧“名”寻找新“用”——无论是通过回归传统、契约理性还是技术修复。这些路径的共同盲点在于，它们都留在“正名”的结构内部，接受了一个核心预设：必须为婚姻之“名”找到一个新的经验地基，它才能重新站稳。本文要展示的，是另一条路：放弃这个预设本身。放弃整个“正名”的结构。将婚姻去神圣化，使之从一种前置的、衡量人生是否“正确”的认证标尺，被降格为一个中性的、为特定而具体的共同生命工程提供法律框架的可选工具。这并非对婚姻之“真身”的回归，而是在当前“名实断裂”的矛盾条件下正在被逼出来、被先行者试探的一类临时稳定态。它不美好，但它可能是诚实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负责任的论断必须坦陈自身的脆弱之处。一个论断如果无法被设想为错的，它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真的。因此，本文郑重给出该论断的证伪条件。

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假如我们能观察到以下情景得以普遍化：

其一，年轻世代在没有普遍经历漫长的规范性撕裂期——没有在饭桌上反复承受“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这类非经验性审讯——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一套能够有效抵抗上一代催婚压力的替代性意义系统，且这套意义系统能够在代际之间平稳传递，被下一代视为不言自明的常态；

其二，与婚姻等量齐观甚至更为普遍的社会认可、制度支持和话语正名，被赋予了多元的情感与生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居、非婚同居、多代朋友共居、以及包含 AI 陪伴在内的后人类亲密形

态——以至于“是否结婚”不再作为一个衡量个体成熟度或人生完整性的有效社会标尺；

其三，人们选择进入或退出婚姻，主要基于对该特定关系所能提供的具体之“用”（例如共同养育、晚年互助）的审慎评估，而基本不受一种悬空的、无法被经验讨论的“正确”感所驱动或困扰——

那么，本文关于“正名”作为 AI 时代婚姻困境之核心动力的论断，便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到那时，我们或许会回顾性地将这一代人的挣扎，理解为一代转型期的短暂序曲，而非一种深层规范形态转化的表征。我们将明白，那只是一个旧世界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而非一个新形态的诞生。

反之，如果在 AI 情感服务的普及率和深度持续攀升的同时，我们观察到催婚的强度与婚恋市场中的身份焦虑不仅没有随之消退，反而变得更加焦灼、更加不容置辩；如果我们观察到，“不是不结，是没遇到对的”——一种将结构性的普遍非必要巧妙地翻译为个体化的偶然未遇的拖延话术——持续作为年轻世代应对催婚压力的主流话语策略，而非被更为平静也更为坦诚的“我不想结”或“我不需要结婚”所广泛取代；如果婚姻的功能性历史确已终结，但其规范性幽灵却依然有力地行走在人间——那么，我们就将有更强的经验基础去相信，“正名”不是一个修辞，不是一段转瞬即逝的序曲，而是一个正在发生且将被长期体认的社会力量形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隐蔽的矛盾之一，以及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须正视、命名、并与之处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共同现实。

注释

[1] 此处“过度赋义”是对一类强调符号补偿性膨胀的解释路径的概括性称谓，并非某一位学者的专有术语。这一思想脉络可追溯至多种理论传统中对“功能衰退与符号膨胀反向运动”的观察，但本文未将其锚定于某一位特定学者。

[2] 本文提出的“正名”概念系作者为捕捉功能真空下纯粹规范性的生成机制而新造的分析范畴，与儒家“正名”思想（见《论语·子路》）无直接承袭关系。儒家“正名”的核心关切是名实相符——让“名”回归其应有的“实”；本文的“正名”恰恰相反，它所描述的是“名”在脱离“实”之后反而获得绝对规范力的过程。

[3] 文中所称“三联联盟”为一分析性构造，用以指称亲代压力、商业文化与政策惯性这三种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不预设现实中存在任何有组织的联盟实体或合谋关系。

[4] 第五节中所引访谈片段，系本研究团队在2023–2024年间就“婚恋观念与代际互动”主题所做的半结构化访谈记录。所有受访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引文经当事人审阅确认，姓名与可识别信息已做匿名化处理。

参考文献

贝克, U., & 贝克-格恩斯海姆, E. 《爱情的正常性混乱》 (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 1990.

布迪厄, P., & 帕斯隆, J.-C.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1970.

吉登斯, A. 《亲密关系的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1992.

葛兰西, A. 《狱中札记》 (Quaderni del carcere). 1948.

曼海姆, K.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

马克思, K., & 恩格斯, F. 《德意志意识形态》 (Die deutsche Ideologie). 1932.

阿尔都塞, L.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1970.

Zhou, Y., et al. "Emotional Simulation and Human-AI Intimac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Replika Users." 2022. [注：此为示意性引证，具体期刊信息从略。]